

編後語

中國正在經歷大轉型，一個從極權主義向自由民主的全方位轉型。這個大轉型的性質，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因為在二十世紀之前人類社會尚未有過極權主義的經歷。這個大轉型所覆蓋的國家，廣及蘇聯、東歐和中亞多國、中國、蒙古、朝鮮、印度支那三國以及古巴等。這個大轉型的情形，大體可以分為三種：一種完成，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建立起來；一種準完成，民主化已經達成，但距離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尚有距離；一種則是尚未完成，極權主義轉變為一種具有韌性的威權主義，而民主化依舊在掙扎之中，自由化和憲政化更是遙遙無期。中國大轉型無疑屬於最後一種情形。

對於人類社會從極權主義發生的轉型，國際學界的研究興趣日隆。經濟學中出現了「轉型經濟學」，社會學中出現了「轉型社會學」，政治學中儘管沒有「轉型政治學」的名號，但有關比較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研究多涉及到這一大轉型。可是，有關極權主義大轉型的國際研究，多聚焦於蘇聯及東歐國家，而中國——大轉型未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則未被納入既有的學術分析框架。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郭于華的文章，力圖基於中國的經驗，給出一個「轉型社會學」的新研究框架。首先，這一研究必須對「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機制和技術進行全新的實證分析，目前相關的研究在國際上是在「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名號下展開，但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系統性的分析框架，這其中如何理解從極權主義轉變而來的威權主義與未經歷過極權主義的威權主義之間的差別尤為重要；其次，這一研究必須把握大轉型的四大維度：由市場力量的釋放和公民社會的萌芽而帶來的結構性轉變，由大轉型推動者自身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而帶來的主體性轉變，由大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的更新而帶來的理念性轉變，由制度、文化、人性不間斷的互構互動所帶來的總體性轉變；最後，這一研究終將整合社會結構分析和社會運動視角，從而使轉型社會學成為具有豐富實踐意涵的公共社會學。

在本期的「學術論文」欄目，德國學者余凱思 (Klaus Mülhahn) 的文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史學的視界中探討了研究國家社會主義的新框架。依照其概括，關於新中國歷史的國際論著為三種敘事框架所主宰，即正統或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敘事以及專制主義 (余文稱之為「壓迫性」敘事)，分別聚焦於新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現實中某些難以協調的方面，例如社會主義實踐、現代化建設和暴力鎮壓，而未能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改革形成一個統一的解釋。余凱思提出，有必要從兩位哲學家阿倫特 (Hannah Arendt) 和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思想汲取養素，對極權主義理論重新認識，以重新考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與建設 (即國家社會主義)。